

■本报赠阅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国家机关、国资委系统、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中国企联会员企业 ■新闻热线: 010-68701575 ■新闻监察: 010-68701250 68701050 ■广告热线: 010-68701052 ■发行热线: 010-68701548

中小企业成本大涨 02  
直面“洋种子”入侵 05

绝地突围:重生故事 02  
稀土整合引发泡沫之忧 06

中小企业资金链告急 03  
电动车“傍名牌”样本调查 07

王忠禹会见日本经团联代表团时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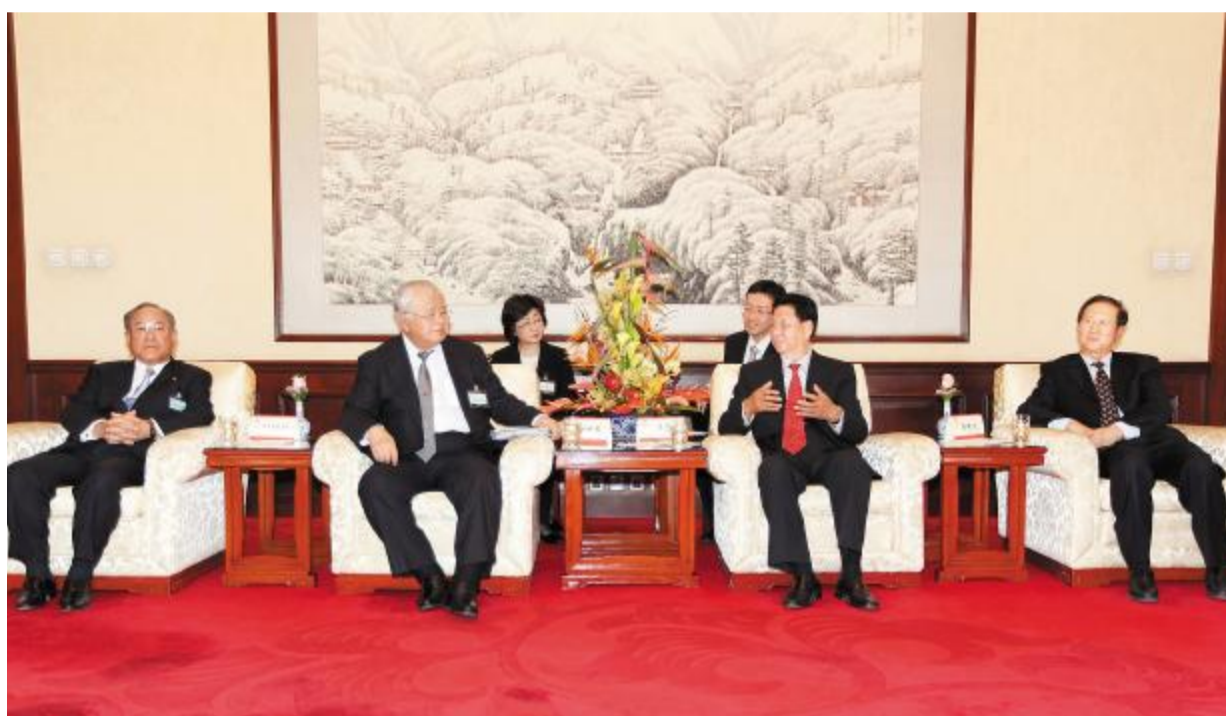
## 提高合作水平 实现互利共赢

【记者林瑞泉北京报道】5月13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米仓弘昌会长、御手洗富士夫名誉会长率领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访华团主要成员。

王忠禹首先对日本经团联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在大地震中受灾的日本人民表示诚挚的问候。他说,日本经团联在日本遭受重大地震灾害的困难情况下仍组团访华,这表明日本经济和产业界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他表示,中国企业界十分关心日本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国企联积极支持中国企业以适当的方式支持和参与日本灾后重建。

王忠禹高度评价了中国企联与日本经团联多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他向日本客人介绍了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有关内容和企联的相关工作,并希望继续与日本经济界开展友好合作,在继续巩固与日本经团联传统合作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的合作水平,积极帮助日本企业参与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开发战略,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米仓弘昌感谢中国社会各界对日本灾后重建工作所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日本经团联正积极努力,全面开展日本灾后恢复建设工作,争取早日重建家园;同时,日本经团联



5月13日,中国企联会长王忠禹(前排右二)、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前排右一)会见了日本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前排右三)、日本经团联名誉会长御手洗富士夫(前排右四)一行。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也愿意与中国企联密切合作,鼓励日本企业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建设,进一步巩固和推进两国经贸关系和产业发展的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

中国企联副会长、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左鸣,中国企联副会长、中国建筑总公司董事长易军等参加了会见。参加会见的日方代表有:日本经团联评议员会议长、新日本石油会长渡文明,日本经

团联副会长、东丽株式会社社长神原定征,日本经团联副会长、野村控股会长氏家纯一等。中国企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有关代表和天津市静海县有关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见。

### 中小企业经营困境调查

## 中小企业出现第二轮危机

“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5月13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本报记者 田晶 王静宇/文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轮危机,正在向中小企业逼近。

“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5月13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周德文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他一直在跟踪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覆盖全国范围的调查系统,并为系统提供温州的中小企业动态。

根据今年的系统监测信息,周德文判断说:“现在中小企业已经出现新一轮危机,而且比2008年那一轮更为严重。”至于中小企业目前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的比例,周德文表示“太敏感,不能说”。

此前,全国工商联耗时两个多月对广东、浙江、江苏等16个省进行调研,结果发现,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更加艰难。

### 温州老板接连“失踪”

5月10日下午,温州最高气温达到33摄氏度。

温州市百里路麻杆小区3幢1701室,大门上贴着“西西里”托管连锁机构海报,上面印着报名费用等信息。室内则是一片狼藉,一些教学用品已

被打包到一旁,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处理留下来的书本。

“前天我接到主管电话,告知老板不知跑哪里去了,教学点将要关门停业,并要求帮忙通知家长。”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目前,“西西里”百里路教学点有22名学生,瓦市教学点有13名学生,“这些学生都已缴纳了这个学期的托管费,有的连下半年的托管费都交了。费用以一个学期为期限,在1000元到6000元不等。”

不知何踪的老板名叫洪邦云,早年在温州瑞安注册了托幼机构“西西里”,之后将网点延伸到乐清、温州市区、台州的温岭、椒江等地,共有60个教学点。温州瑞安警方当日正式宣布:“西西里”连锁教育机构全面停业,警方已立案介入调查。

洪邦云并不是第一个突然从人们视线中消失的温州老板。

从4月初起,乐清的电缆制造企业三旗集团濒临破产,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因运营者黄鹤携家人“出走”而停业,温州餐饮连锁品牌波特曼、港尚记因老板辛勤为夫妇“消失”而歇业。

周德文告诉本报记者:“这几家企业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他们名气大,实际上玩失踪的温州企业远不止这几家。从春节以来,很多工厂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开工。”

“而且,病人膏肓的也不仅仅是温州企业。我昨天刚从北方回来,内蒙、天津的中小企业现在问题也很严

重,日子都很难过,很多企业可以说是危在旦夕。”周德文说。

近日,内蒙古包头的富豪惠康集团董事长金利斌因深陷巨额债务自焚身亡。周德文说:“不管是温州还是内蒙,银根紧缩后民间借贷盛行,这些企业老板失踪或者自杀,都是被高利贷逼的。”

不借钱开不动机器,借了钱又还不起利息。面对不断攀升的资金成本和越来越薄的利润,对于很多中小企业而言,融资无疑是饮鸩止渴。

“常州的坯布厂现在全面告急。”常州一家纺织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常州是传统的棉纺基地,工厂以来样定织为主,常州企业愿以此此为优势,一方面可以让利润更高,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库存更少。如今,这种模式遭到了挑战。

“第一天报价12元/米,第二天采购商合同传过来,纱价就可能涨了500元/吨,等到第三天把资金打给纱厂订纱时,价格又变了。涨涨涨,挤干了坯布厂的利润。”上述纺织企业负责人抱怨说,“纱厂要求全额款到发货,这让坯布厂资金链全部吃紧,现在我们这些坯布厂的流动资金基本上都枯竭了,经常是有订单下来却没钱买纱织造,很多工厂都借了贷款以弥补流动资金不足。”

有订单也不敢接

夏季服装订货高峰期而至。

5月13日下午,浙江德馨服装加工厂总经理张振超正在车间里忙活着,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

“我是在车间干活,现在工人少了,工人工资又多了,我们工人都坐在车间干活,能干多少算多少吧。”张振超嗓门很大,声音有些沙哑。

谈及最近部分中小企业出现倒闭的问题,张振超说:“原材料上涨很厉害,用工成本也在增加,利润越来越薄。我们这里最近也有几家企业停产了,我们的经营状况也不好。”

张振超说,去年一年棉布价格涨了50%左右,今年还在继续涨,“我们这些做服装加工的企业,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幅波动,往往一批订单还没开始做,就发现我们实际上已经亏了,因为原材料涨了价。”

“现在做代工毛利率很低的,有5%到8%就不得了啦。我们帮大客户做订单,除掉成本后,一件短袖衬衫真正也就赚5块钱左右。”张振超说。

张振超介绍说,现在厂里做的这批男式短袖衬衫总共2000多件,交货期为12天,“假如接了订单后原材料涨幅超过预期,根本没法赚钱,甚至还会亏本。很多同行都只接受报一个星期内的价格,时间越长风险越大,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做短期订单,最长半个月。”

“情况好的话,这批衬衫能赚一万元左右,虽然和前两年每件利润十几元相比差远了,但这已经让我满足了。”张振超说。

(下转第五版)

### 经济学家访谈

专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 产业转移和深化教育: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本报记者 王敬/文

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与货币政策的收紧,再次将大量中小企业逼到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的边缘。其中,以第一次人口红利起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同时,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关闭。

“第一次人口红利是有限的,其逐渐消失后还可以创造条件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而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5月12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蔡昉认为,通过产业转移和教育等途径,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 用工荒是中国人口红利结束的前奏

《中国企业家报》:2011年年初,中国多个地区企业出现了“用工荒”,您觉得中国真到了用工荒时期吗?

蔡昉:随着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递减,并预期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此后绝对量开始减少。这个长期趋势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增量相应减少,农民工工资逐年提高。

这种情况反映在企业的用工方面,则导致了普遍的“用工荒”。这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适应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些产业大多是由非农产业劳动者创造。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就业扩大,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沿海地区则直接感受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很多内地的农村劳动力,不用到东南沿海,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实现不错的就业,而家门口消费相比沿海又相对较低,他自然留在家乡打工,这也加剧了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引起工资上涨。

《中国企业家报》:您是如何理解“人口红利”的?

蔡昉: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概念,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民工成为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比较优势,从而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占领国际市场。

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增加以及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阶段,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两个方面,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被称为人口红利。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的获取是有条件的,特别是需要一系列制度条件。

事实上,存在两种“人口红利”:第一种是纯粹从年轻的人口结构上面得到的,主要表现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过去推动中国高速增长的就是这种人口红利。第二种是指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产生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如人们变老了,会形成未来做储蓄的观念,无论是通过养老保险制度,还是通过自身的安排,会把这笔钱拿出来通过资本市场或其他投资获得收益,从而可以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储蓄率。另外,如果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未来的职业和产业结构将更适合老年人,社会没有觉得他们的价值会降低,还是很好的劳动者。

《中国企业家报》:人口红利和用工荒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蔡昉: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实现地区间转移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通过深化教育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巨大潜力,可以使中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从而使人口红利得以延续。

我们讲的人口红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通常用人口抚养比结束其下降趋势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义是:把16岁以前和65岁以后的依赖型人口做分子,把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计算两者的比率。

我个人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虽然即将结束,但是还有制度潜力没有挖掘,比如说农民工的市民化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作为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庞大的消费需求,都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即使是在2015年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地区之间仍然有差别。这可以通过形成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为我们提供一个缓冲期,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延长退休年龄做好准备,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

### 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看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企业家报》:在中国飞速发展的30多年中,“人口红利”起了不可否认的巨大作用。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同时,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关闭。您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下转第九版)